

主編語

「《道藏輯要》研究計劃」最先是由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1962–2011) 教授發起的。她於2005年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麥谷邦夫教授和維習安 (Christian Wittern) 教授合作開展此項研究計劃，且很快就得到六十多位來自日本、臺灣、歐美和中國大陸等地的道教學者答允參與出版《道藏輯要·提要》。2005至2007年間，京都大學、臺灣蔣經國基金會、日本學術振興會等機構相繼為這項獲認為將對近代道教史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研究計劃提供資助，大大推動研究計劃的進行。麥谷邦夫教授在其為本書所撰的序文，已詳述了研究計劃在這段時期的發展情況和達成的初階成果。

2009年4月2日，莫尼卡教授接受我的邀請來訪香港中文大學，以「《道藏輯要》研究計劃」之題，為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作專題演講。2009年11月26日至28日，莫氏再度來到中文大學，出席中心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收入在中心創刊的《道教研究學報》第1期 (2009年)，論文題目為「道藏輯要研究計劃：一部道藏的變遷」。2010年1月6日至8日，我們一起參與香港青松觀道教學院舉辦的學術會議。當時我正式接受莫尼卡的邀請，共同主持中文版《道藏輯要·提要》的出版工作，並且協議了本書交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1年3月初，我前赴京都開會，原先計劃同莫尼卡教授和麥谷邦夫教授討論所收到的部分中文提要稿件。抵達之後，即得悉莫尼卡患病，但仍能電話聯繫，交換了提要稿件的修改意見。我在京都逗留數天後返回香港，3月10日晚，京都卻傳來哀訊，莫氏心臟病復發，不幸離世。

為了不讓「《道藏輯要》研究計劃」中斷，2011年11月，我再赴京都，與麥谷邦夫教授和維習安教授面談，就雙方的合作協議達成一致意見。協議內容包括：(1)《道藏輯要》電子文本的輸入及校對工作，仍將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單位為中心，繼續進行；(2)《道藏輯要》解題目錄的編輯及提要出版等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學黎志添教授及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負責執行及完成。由此開始，我擔負起主持這個項目的責任，把「《道藏輯要》研究計劃」從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轉到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為了促進提要的收集、編輯、評審工作，保證其出版質量，我決定成立《道藏輯要·提要》出版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麥谷邦夫教授、金志珙教授、森由利亞教授、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教授、劉迅教授、康豹 (Paul R. Katz) 教授、阿琳娜 (Elena Valussi) 教授和王宗昱教授。首次編輯委員會會議正式在2012年1月7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我接手主持「《道藏輯要》研究計劃」的工作後，立即開始全面地研究《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一方面，莫尼卡教授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使我得以深入且全面地認識嘉慶版《道藏輯要》和光緒版《重刊道藏輯要》之間的編纂關係，以及各種版本的流傳的情況；另一方面，我開展了「明清呂祖扶乩信仰與文人道教乩壇研究計劃」。首先，我集中研究清初順治至乾隆期間在湖北武昌、浙江杭州、江蘇蘇州和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的由不同呂祖扶乩道壇弟子編纂和刊刻的四種《呂祖全書》，包括：(1) 由劉體恕、黃誠恕等彙輯，乾隆九年刊刻完工的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2) 由蔡來鶴及其弟子邵志琳 (1748–1810) 在乾隆四十年 (1775) 採集增添後完成的新編六十四卷《呂祖全書》；(3) 大約在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刊刻流傳後不久，即乾隆末年，有蘇州呂祖信仰弟子汪柳亭、邱通宵、余馥林和陳聽濤等人，重新刊刻了另一部經過考訂之後的呂祖降鸞道書，即是所謂考訂本的《呂祖全書》，稱為《呂祖全書宗正》，共有十八卷；(4) 第四種《呂

祖全書》初刊於嘉慶八年(1803)，是由北京覺源壇的呂祖信仰弟子蔣予蒲(1756-1819)與同門弟子共同重訂舊本《呂祖全書宗正》的成果。由覺源壇弟子重訂和刊刻的十七卷本《呂祖全書》，稱為《呂祖全書正宗》。上述有關《呂祖全書》的研究成果已發表在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以下引述該篇論文的結論：「很清楚的是，以《呂祖全書》為代表的呂祖扶乩信仰並不是由那些在全真教龍門派道觀裡的道士所編撰、刊刻和推廣的，而是發生在各地的呂祖乩壇，由信仰呂祖降鸞的儒家知識份子以非常投入的態度去採集、彙輯、出版和流傳的。這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來未有過的以信仰呂祖扶乩的信徒為核心成員去撰寫、編纂和刊刻道教鸞書的宗教寫經運動。」

接著，為了對嘉慶《道藏輯要》的編纂者及相關的呂祖道壇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又開展研究嘉慶時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天仙派信仰。研究的進路是從蔣予蒲編纂的《呂祖全書正宗》開始。有關覺源壇和《呂祖全書正宗》的研究成果，亦已發表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6期(2015年)。對此，我的研究觀點是，若要掌握《道藏輯要》編纂計劃的源起和目的，就必須從《呂祖全書正宗》開始，以之作為源頭入手研究。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在嘉慶八年完成編纂《呂祖全書正宗》之後，蔣予蒲及覺源壇弟子再受孚佑帝君呂祖之命，合力編纂《道藏輯要》。據大羅領班蘇朗真人降鸞的序言，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的目的，可以說是延續著《呂祖全書正宗》的志向，且擴大呂祖真傳丹道經典的收錄範圍，以成就「性命之全功、天仙之大乘」。作為「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的《道藏輯要》，實收了288部道經，其中有198部藏內道經和90部藏外道經(詳見本書筆者所撰的〈綜述〉)。比起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只收錄了18種道經，《道藏輯要》所收的道經總數當然是更龐大，而涵括的主題範圍更廣泛，但我們仍可以說《道藏輯要》是覺源壇弟子在完成《呂祖全書正宗》的基礎之上，繼承該壇的天仙金丹信仰和志向的同時，進一步編纂的結果。

研究《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時遇到的困難很多。雖然嘉慶版《道藏輯要》是繼明代《道藏》之後清代最重要的道教叢書，但學術界至今對它的認識和研究仍處於一種不理想的狀況。莫尼卡曾慨嘆：「《道藏輯要》的形成至今仍是個謎。」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9卷(2020

年)刊登的〈《道藏輯要》與《重刊道藏輯要》所收道教經書的比較〉一文,我概括了幾個核心的研究問題。第一,是《道藏輯要》的第一編纂者是誰的問題。誠然,早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閻永和、彭瀚然、賀龍驤等編纂《重刊道藏輯要》時,他們已經有意地對《道藏輯要》的來歷提供一種錯誤的說法,即虛構了康熙年間彭定求(1645–1719)輯成《道藏輯要》的說法。例如賀龍驤在其所撰的〈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中說:「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輯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來總目止載卷數,未列子目。」這種錯誤的看法至今仍然為許多《道藏輯要》學者、出版商和中國大陸各省及大學圖書館目錄所引用。例如1995年趙宗誠發表的〈《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一文對嘉慶蔣予蒲本《道藏輯要》作出嚴重的誤判,趙氏提出以下的結論:「到了嘉慶(1796–1820)年間,有好道之士蔣元庭(案:即蔣予蒲,字元庭),在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共79種。」

第二個問題是究竟嘉慶年間刊刻的《道藏輯要》總共流傳了多少種不同的版本,以及到底《道藏輯要》收錄了多少部道經。依筆者之見,未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過去許多研究者缺乏運用(或未能找到)蔣本《道藏輯要》作為準確的文獻依據,以及未能深入比較不同《道藏輯要》版本間的差異,以致學者經常引用一些對《道藏輯要》收錄道書作出錯誤計算的數據和研究結論。例如1935年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翁獨健附錄了由他撰成的〈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但是,翁氏所依據的《道藏輯要》版本只是成都二仙庵編纂的光緒版《重刊道藏輯要》,因此,他未能利用嘉慶版《道藏輯要》來校證《重刊道藏輯要》,以致未能準確地得出以下問題的答案:究竟嘉慶版《道藏輯要》實收了多少部新增的藏內和藏外道經,然後又有多少部道經為光緒版《重刊道藏輯要》所增收等。

第三,《道藏輯要》研究者要面對的另一種困難是不同《道藏輯要》版本收錄的道經數量亦不同。而更複雜的是,各種嘉慶版《道藏輯要》的〈總目〉所記載的經目與其實收的道經數目也不一致。造成這種編目混亂的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不同版本的《道藏輯要》在刊刻過程中出現各種編輯和修訂上的改變。

第四，造成學者對《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實收道經的數量問題不容易達成一致的原因是因為各自可以採用不同的計算方法和標準。其中，使計算方法出現差異的因素係於《道藏輯要》實際收錄道經的數量與〈總目〉所載的經目經常不同。一部道經由幾種獨立經文拼合而成的情況很多（參本書〈凡例〉和〈綜述〉）。

第五，至今令研究者十分不解的問題是，覺源壇的活動消息在蔣予蒲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辭世之後便迅速失去了蹤影。而至於與覺源壇直接相關的《道藏輯要》的命運，正如莫尼卡的感言所說：「遺憾的是，這一偉大的計劃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蔣予蒲死後，這部本應得到公認的清代新《道藏》，卻只為少數收藏家所珍視。」據筆者目力所見，嘉慶二十四年蔣予蒲卒後，只有湖州金蓋山道壇的閔一得（1758–1836）於道光十一年（1831）在《古書隱樓藏書》裡收載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中提及蔣予蒲的《道藏輯要》，稱：「（《道藏輯要》）板在京邸，及取歸，而（蔣）侍郎又北上，卒於京師。」不僅是《道藏輯要》得不到預期的成果，令人更遺憾的是，蔣予蒲和其他覺源壇呂祖弟子的編纂目的和功勞更被隱沒於後人對《重刊道藏輯要》認識的背後之中。至今，仍有一些學者支持彭定求為《道藏輯要》第一編纂者之說，且由於缺乏對覺源壇的研究及完全不知有《呂祖全書正宗》存在的前提下，卻主張說：「事實上，蔣元庭增補的《道藏輯要》本身，并未就蔣元庭與《道藏輯要》的關係作任何說明。」

前後歷經十五載的研究過程，三冊本中文版《道藏輯要·提要》的正式出版代表了整個「《道藏輯要》研究計劃」之最終研究成果。建立在莫尼卡提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礎之上，本書決意不將嘉慶版《道藏輯要》與光緒《重刊道藏輯要》分割來研究，反之是要將這兩部清代道教叢書的流傳和它們各種版本之間的關係結合起來分析和比較。通過對這兩部清代道教叢書總共收入的307部道經的仔細考證和內容分析，本書既能從中全面掌握《道藏輯要》與《重刊道藏輯要》之間的延續關係和演變發展，但同時又能完全明瞭各自編纂的目的、處境、過程和影響。可以這樣說，今天我們所讀的道藏經，已是明代完成的《正統道藏》，所收道書都是明萬曆之前的，最早可上溯到六朝的古代道書。清代沒有一部由朝廷編修的《道藏》。而由於

清代又從未有過國家批准收集的《道藏》，因此可說，《道藏輯要》及《重刊道藏輯要》都具有特殊的道教歷史意義。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兩部新「道藏經」都是在「民間」的道教信仰團體中誕生的。這種新局面實在反映了清代以來，道經知識和內丹修煉的傳播形式和中介已經產生了改變。《道藏輯要》及《重刊道藏輯要》代表著兩次重要的傳播方式的革新或者說新的信仰運動形成——由文人知識分子推動的呂祖扶乩道壇活動，以及在地方道觀由道士與知識分子聯合刊刻道經。這實在證明了帝國晚期道教信仰蓬勃的生命力和新發展。雖然，在明代編修《正統道藏》之後，明末至整個清代及民國四百餘年間，再也沒有由官方發起、主持編輯的《道藏》；但是，這不等於說，清代道教經典文化沒有得到傳播和發展。總結而言，研究《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正能夠令我們對道教在清代發展和變革有一種與傳統不一樣的歷史新認識。

《道藏輯要·提要》一書終於在2021年完成並順利出版，我首先要衷心感謝74位撰寫提要的學者，他們分別來自日本、中國大陸、臺灣、韓國、香港、澳門、新加坡、英國、法國、荷蘭、德國、美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研究院或學術機構，這份合作名單足夠見證了「《道藏輯要》研究計劃」的國際視野和集體成就。其次，我要感謝八位編輯委員會成員，包括麥谷邦夫教授、金志炫教授、森由利亞教授、高萬桑教授、劉迅教授、康豹教授、阿琳娜教授及王宗昱教授。他們為各篇提要提供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再者，我要感謝在過去九年間曾經在不同階段裡協助我完成本書出版工作的道教研究中心研究員，他們是祝逸雯博士、胡劼辰教授和陳文妍博士。特別是胡劼辰教授，在後期階段，他付出許多時間和精神，協助我同各編輯委員會成員及眾位提要撰稿者聯絡、溝通，這令我可以集中精力主持整個《道藏輯要》的研究計劃。陳文妍博士亦為本書稿的出版工作作出卓越貢獻。

最後，本書得以順利出版，我要衷心感謝四位歷任蓬瀛仙館的理事長，包括黎顯華道長、馬梓才道長、李宏之道長和梁德華道長，他們一直支持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並特別立項，慨允捐資支持本書的出版。此外，筆者還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組稿編輯

葉敏磊女士和編輯張煒軒先生。他們熱心支持本書出版，並提供各種在編輯、設計、排版和印刷等工作上的方便。本書有關「清代道教呂祖扶乩道壇和信道文人」之部分研究成果，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之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支持計劃「晚清至民國廣東文人士紳與道教關係的研究」(Late Qing/Republican Literati and Gentry in Guangdong Daoism, 2019–2021) 的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20年6月1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具有版權的資料

麥谷邦夫序

《道藏輯要·提要》歷經十載光陰完成，終於順利付梓。我作為最初參與出版計劃的成員之一，實在無比欣慰。《道藏輯要》乃明清道教研究最基本的資料，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此次國際學者同仁通力完成其詳細的提要，不僅對學界以及道教界有所貢獻，對關心道教的普通人士亦不無裨益。我深信，在今後很長的時間裡本書將會成為研究明清道教的學者的出發點。

本書之出版經年歷久並迂迴曲折，最終之所以能實現，歸功於香港中文大學黎志添教授的奉獻。黎教授為了這個計劃的順利完成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此我對他表示由衷的感謝。應黎教授撰寫序言的邀請，我僅以此文回顧出版《道藏輯要·提要》的漫長過程，完成此最後交給我的任務。

《道藏輯要》的出版緣起於已故莫尼卡博士主持的「《道藏輯要》計劃」。《道藏輯要》是蔣元庭（1755–1819）所編撰的道典叢書，之後經歷複雜的變遷，迄今留存諸多不同的版本。莫尼卡博士很早就指出《道藏輯要》對清代道教的重要性，她在研究《道藏輯要》的編撰和流通的過程的同時，也積極地調查散逸在世界各地的版本。在此基礎上，她組織了全面推進《道藏輯要》的研究計劃。

「《道藏輯要》計劃」有三大目的。第一，完成各個版本的文本電子化，並標記出各版本之間的異同。這個電子文本不是單純的「文本—數據」，而

是根據需要復原各個版本的版面和細微的字體差異，以適應學者學術上的要求。第二，根據做出的標準文本出版全新的《道藏輯要》。第三，完成《道藏輯要》所收道書目錄以及各部道書的詳細解題，並出版英文、中文、日文三種語言的解題目錄。

為了達成以上目的，莫尼卡博士一邊摩厲以須，一邊四處奔走籌募起始資金。這個計劃一開始獲得了臺灣蔣經國基金會的援助而得以啟動，著手於製作電子化文本的具體工作。當時莫博士作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在我手下工作，她熱切希望我能支持這個計劃。我也深知博士對這個計劃的熱情，便於2006年向京都大學申請經費，並得到了批准。此外她自身也繼續向蔣經國基金會申請贊助，也獲通過了。這些經費成為了研究計劃的基石，2007年我作為研究代表，向日本學術振興會提交了以「《道藏輯要》與明清時代的宗教文化」為題的研究計劃，為期四年。很幸運這個申請獲得了批准，我們拿到了不能說非常充足但也相當大的一筆研究費，得以迅速推進這個計劃。

作為「《道藏輯要》計劃」的一環，我們的首要工作是完成《道藏輯要》的電子化文本。關於電子化文本的製作，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亞人文情報學研究中心的維習安教授為我們研究開發了適應《道藏輯要》文本特點的最佳的電子化模式。這項工程雖然伴隨著諸多的困難，但我們成功找到了一個嶄新的方法論，能夠解決漢籍電子化時遇到的各種問題，並可以將之推而廣之到其他中國學的研究中。我們通過實際運用開拓了《道藏輯要》電子化的具體道路。另外，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李遠國教授亦組織了《道藏輯要》原文校點作業班，配合我們迅速地完成了電子化文本的工作。時至今日，我們得以一起惠享電子文本的成果。

第二個目的是通過研究《道藏輯要》收錄的諸多文本，考察明清時代宗教文化的多元面相。我們得到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配合，為《道藏輯要》所收錄的道書做一篇詳細的解題，並在此過程中明確《道藏輯要》在明清時代宗教文化中的地位，同時實現「道藏輯要」的第三個目的，即出版解題目錄。我們曾預料在四年間這樣一個短促的時間內向諸多合作者索求無償稿件，再經過翻譯並以完整的形式編輯出來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選定以僅收錄到《道藏輯要》而未曾收錄到《正統道藏》的道典（藏外文本）為中心進

行解題，與《正統道藏》重複的道書則除了一部分納入解題對象，餘下留待來日。

關於解題目錄的編撰，莫尼卡博士是核心人物，從撰稿人的遴選、聯絡，到詳細的撰寫方針，她做了許多工作。正當稿件陸續從國內外寄來時，沒想到莫博士卻於2011年3月10日突然病倒，當天撒手人寰。這真是晴天霹靂，令我們悲痛至極！面臨研究的最終年度，我們在博士逝世後重新調整了研究體系，試圖達成當初的研究目的。然而，失去博士後，這個巨大的空洞卻無從填補，我們無法完成藏外文本的解題，只能以當時收到的稿件提交一個不完整的報告書《〈道藏輯要〉解題集稿》，將後續研究擱置。

解題目錄的出版是「《道藏輯要》計劃」的一環，在莫尼卡博士原來的計劃裡預備出版英文、中文、日文三個版本。其中日文版很早就不得不放棄了，關於中文版，莫博士在世時就已經和黎志添教授達成協議，黎教授已經安排好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博士逝世後，黎教授牽頭把「《道藏輯要》計劃」從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轉到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中心。黎教授組織了《道藏輯要·提要》的編輯委員會，加上原來沒來得及收錄到《〈道藏輯要〉解題集稿》的稿件，進行重新出版。在這之後得到了日本、中國、歐美等多國學者的配合，收集到很多稿件，黎教授不遺餘力地推進了翻譯、編輯等繁瑣工作。如此般，從開始計劃到如今耗費十年光陰，《道藏輯要·提要》的中文版終以完整的形式得以面世。在此將此書的出版告慰莫博士，同時也所有的同仁分享這份喜悅。

本書的出版雖迂迴曲折，卻實現了「《道藏輯要》計劃」的兩個目的——劃時代的電子文本的製作，以及解題目錄的出版。惟願終有時日能實現第三個目的，即新版《道藏輯要》的出版。

最後，再次向黎志添教授以及所有為「《道藏輯要》計劃」辛勞付出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

麥谷邦夫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榮休教授
2020年5月

李豐楙序

欣聞中文版《道藏輯要·提要》這個學術大工程即將出版，作為關心此事的道教學術界中人，既感敬佩亦表歡欣。此一工程歷經波折而得以圓滿，乃是諸多因緣和合始能畢其全功。記得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教授初抵臺北，當時我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她即明確表明三個目標：先期工程是電子化文本，其次是撰寫解題，最後出版二者。當時我在文哲所正進行《道藏》的電子化，此時尚無其他道教文獻的電子化完成，故認為值得開展這項研究計劃。事後回想此一龐大的學術工程，以文哲所能撥出的資源有限，不像後來的商業團體可以快速完成。雖然如此，但我們也累積了足夠的電子化經驗：其一來自於起步較早的電子化佛典，這一部分得力於習維安 (Christian Wittern) 先生的先行經驗，同樣是佛、道兩大藏，佛藏的資源十方具足，故經驗既多，進度亦快。道教經藏雖不能及，卻可吸收其經驗，又因同屬宗教研究的學術動機，他們都能傾囊相助，使我們得以減少許多試誤階段；其二則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的建立，當時我曾參與其事，在初期得到了院方大力支持。莫尼卡教授既有同一目標，當時即陪同她前往與院方商議，希望能在電子化方面提供經費、經驗，多少不拘，在她的團隊的起步階段，仍是一大助緣。在彼此的意見交流中，院方建議她申請蔣經國基金會的贊助，此乃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後來康豹 (Paul R. Katz) 教授參與編委會，即源自此一因緣。

《道藏輯要》亟需解題，此乃莫尼卡教授作為學者的初衷，在麥谷邦夫教授的協助下，京都大學團隊成為最初的力量，亦源於此。唯此一理想的達成並非易事，在此之前，道教學界的工具書雖已有《道藏提要》與《道藏通考》，但條件不同則成效亦異。這兩部書的編成、出版時間較早，道經研究卻與時俱進，而這些工具書卻難以跟進。《道藏輯要·提要》的編纂時機又有不同，就是道教研究世代更替，從提要作者的名單中，即可發現青壯世代參與者所在多有，其訓練、經驗都已相當成熟。在這種整體表現的背後，必須指出一個關鍵：就是在莫尼卡教授遽逝之後，黎志添教授組織的團隊適時接手。作為多年至交之一，我有必要從旁觀者的角度指出此事：其一即香港蓬瀛仙館的長期贊助，建立道院與學界合作的典範，這是身在臺灣感觸最多的，也是《道藏》電子化無法如願完成的原因，即助緣不足！而黎教授則有之，且從此展開許多裨益道教界、道教學界的志業。但徒有外緣仍不足以成事，關鍵還在於主持人全心的投入！這些年來親睹黎教授的學術突破：從《呂祖全書》切入道壇/鸞堂研究，而後結穴於《道藏輯要》的研究，在道教研究上所花的工夫與達成的諸多突破，乃是不爭的事實，其多篇論文的成果皆與文哲所研究集刊有關，從資料到方法都可以視為道教研究的典範。

本書的完成堪稱《道藏輯要》研究的里程碑，在此我繼續提出以下幾項未來的研究方向：其一即出版完整的《道藏輯要》點校本，在《中華道藏》完成後亟需再進一層樓的，就是做出一部更為豐富而精準的《道藏輯要》點校本，其中還包括了明清以來的道經寫本、刊本。這一世紀性工程若將啟動，道教研究同行需認真看待從莫尼卡教授到黎教授展現出的嚴謹治學態度，參考其中的寶貴經驗。其二則是新編道藏解題，目前行世多年的兩種《道藏》的解題類著作均具有代表性，對學界貢獻良多，但顯然還不足以反映當前的學術成果。故在編修新道藏之餘，更急迫的任務是新修道藏解題，這種解題工作理應五年重修一次，方足以反映道教經典研究的新成果。其三則是數位化道藏的公開，雖然不能反對商業出版的作法，但道教經藏作為社會「公器」，其在公開的程度上其實遠不及佛教經藏，主要原因就是商業與宗教之別。在此希望道教機構能夠秉持大道精神，若將來能出版《道藏輯要》點校本，能盡快將數位化道藏「公器化」，如此方能吸引更多

有志道教研究者投入。本人相信，嘉慶《道藏輯要》的刊刻，正是出於覺源壇先賢的濟世之心，這也是呂祖降世濟人的本願！在當前宗教環境否極泰來之際，道教亟需與世界宗教競比，發此大願將民族宗教推向世界，方能顯示道教仙聖與先賢的民族氣度與氣派。故托諸此序敬陳此願，以賀黎兄與莫尼卡教授仙靈，更期待未來的道門諸子完成此一世紀大願！

李豐楙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2020年9月20日

序於指南宮山腳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梁德華序

——明經典之要旨，啟研究之新章

道教以「經」為「三寶」之一。道書說：「大道非師不傳，非經不印。經者，千聖相傳之心印。」又說：「道本無言，非言不顯；道本無經，非經不明。」道教信仰奧妙無窮的大道，而它的信仰和智慧，則藉由仙真用「經」傳到人間，因此「經」是連接天人之間的津梁，學道之士要依靠「經」來修行和證道。從唐代到明代，高道屢次受命編集傳世的道經和道書，然後由朝廷以「道藏」之名頒行天下，為玄門之盛事。惟有清一代，朝廷未嘗推動編纂道藏。直至嘉慶年間，北京覺源壇弟子蔣予蒲等人恭奉純陽呂祖仙師的鸞示，以「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真之典要」為宗旨，選取明代《正統道藏》部分經典，添加新出經典而後刊行，稱為《道藏輯要》。這套「非官修」的道藏，後來經由四川成都二仙庵的重刊而發揚光大。

《道藏輯要》對於玄門道侶來說，是蘊藏真文寶錄的琅函寶笈；而對於學者來說，則是研究道教在清代發展的寶貴材料。然而《道藏輯要》的早期版本不僅傳世甚少，更是版本不一、散佚不全，這種狀況為研讀這套道教叢書造成了不少困難。要充分發揮《道藏輯要》的價值，對它的詮註、敘次、考證的工作都刻不容緩，於是學者遂提出「《道藏輯要》研究計劃」。因緣際會，這個源起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莫尼卡教授的研究計劃，最後移交到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主持，經

遍各方專家學者近十年的艱苦努力，該研究計劃的成果之一——《道藏輯要·提要》終於付梓。

蓬瀛仙館接續廣州三元宮之全真龍門派道脈，向來以闡揚道範、倡導玄宗為己任，而近二十年來更特別注重推動道教學術研究，期望宗教與學術發展相輔而行，於2006年資助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在過去的三期合作當中，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在教育、研究和出版方面都碩果纍纍，而今《道藏輯要·提要》的出版，更是一個令人欣喜的最新消息。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於2019年公布這項研究成果即將面世，為本館九十周年館慶增添不少光彩，而它亦恰好能用來標誌蓬瀛仙館與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第四期合作的開展。

《道藏輯要·提要》將會為研讀《道藏輯要》提供一部可靠的指南，作為一個大型基礎研究，它無疑可以為道教研究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二百多年前，《道藏輯要》的編纂緣起於純陽呂祖仙師之鸞示，蓬瀛仙館屬全真宗龍門派之道觀，同樣恭奉純陽呂祖仙師，今天有幸參與《提要》的出版，實在是一個殊勝因緣。在此期願大眾能夠通過研讀道教經典，感悟到大道奧妙無窮的智慧。

梁德華(景華)

蓬瀛仙館第廿四屆理事長

2020年6月